

DM73/0504

张国华 著

中国秦汉思想史

人民出版社

## 本卷提要

本书是一部系统而又深入地阐述秦汉时期思想发展的学术专著。作者打破了传统的以人物排队和把思想家的思想简单地划分为宇宙观、认识论等几大块的研究方法,而以秦汉时期的学术思潮为主线,以汉代思想家普遍关注的“天人”问题为核心,对秦汉时期学术思潮的演进作了严密的历史考察。本书不仅以大量的笔墨对秦汉学术思想史上的儒学经学化与经学神学化等重大学术问题进行了详尽探讨,而且对儒家之外的其他各家尤其是道家在秦汉思想史上的地位等问题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本书立论新颖,论证充分,文字流畅,为读者真实地再现了秦汉四百四十年思想发展的原情本貌。

# 目 录

## 中国秦汉思想史

<b>一、秦汉思想概述</b>	1
<b>二、“黄老之学”在西汉的盛衰</b>	5
(一)秦专任法家治国的失败与“黄老之学”在汉初的盛行	5
(二)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与“黄老”思想之谜的揭破	8
(三)“黄老之学”的宇宙图式与社会秩序	15
(四)西汉前期“黄老”思想的总集——《淮南鸿烈》	26
(五)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对“黄老之学”所作的学术总结	41
(六)“黄老之学”在西汉中期的衰落	49
<b>三、儒家由子学到经学的演变</b>	53
(一)汉初儒学及其特征	53
(二)董仲舒与西汉中期的今文经学	94
<b>四、儒学由经学到神学的堕落</b>	123
(一)谶纬神学的兴起	123
(二)《易纬》思想剖析	129
<b>五、西汉末期的儒学改良运动</b>	146
(一)刘向、刘歆改良儒学的斗争	147
(二)扬雄恢复正统儒学的努力及其创建新的儒学思想体系的尝试	152
<b>六、两汉之际的道家“老学”</b>	168

(一)道家“老学”在两汉之际的昌兴	168
(二)《老子指归》与《老子河上公章句》考辨	170
(三)《老子指归》的道家思想	177
(四)《老子河上公章句》的道家思想	184
<b>七、东汉前期的经学、神学与《白虎通义》</b>	187
(一)汉代建立统一的封建统治思想的历程与《白虎通义》一书的形成	187
(二)《白虎通义》的神学世界观	191
(三)《白虎通义》强化封建纲常的“三纲六纪”说	196
<b>八、王充对汉代神学迷信的批判</b>	199
(一)王充对汉代“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批判	199
(二)王充对汉代经学迷信的批判	203
(三)王充对汉代世俗迷信的批判	206
(四)王充对“生而知之”先验论的批判	211
(五)王充思想的局限性	214
<b>九、结 语</b>	217

## 一、秦汉思想概述

秦汉(上起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下迄公元 220 年东汉灭亡)时期,随着统一的封建帝国的出现,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的局面已告结束。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的需要,秦汉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探索。在这种探索中,无论是其经验还是其教训皆对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它以法家而“倾邻国”、“雄诸侯”、“兼吞战国”、统一了天下,但它也因法家的“专任刑罚”、残暴不仁、横征暴敛、穷奢极欲而骤亡。秦王朝在选择法家作为封建国家统治政策的尝试中遭到了惨痛的失败。

汉之初,随着秦的灭亡和秦专任法家治国的失败,儒道两家的学说又开始活跃起来。但是,由于当时外戚、功臣、郡王的大力提倡,由于道家“黄老之学”的“文武兼备”、“刑德并用”、“以法为符”、“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思想更有利于稳定汉初的政治形势并恢复汉初残败的社会经济,所以道家“黄老之学”应时而成了汉初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并逐渐成了一种社会思潮。在西汉前期的“黄老”思潮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黄老”思想家,淮南王刘安与司马谈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刘安主持编写的《淮南鸿烈》是西汉前期道家思想的总集,是西汉道家思想之“渊府”;

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是对汉初“黄老之学”所作的学术总结。

汉初几十年道家政治的实行，的确使凋敝不堪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在此基础上，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便不再愿意象文、景那样“恭俭无为”、“贵柔守雌”了，他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不仅要试图把大权独揽于自己手中，以树立作为皇帝的最高权威形象，而且他还要试图消除郡国力量过于强大这个内患与匈奴侵边这个外患以建立“大一统”的汉帝国。因此，到这时以“无为”为标榜的道家思想已成了汉武帝“有为”政治的障碍，于是董仲舒的以鼓吹“君权神授”和“《春秋》大一统”为主旨的儒家学说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并被定于一尊。儒家学说终于在王权的支持下由子学上升而成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经学”。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其时历经战乱兵燹，先秦儒家的典籍，原本多佚。因此当时的儒经博士所传习的经典多是由汉初经师凭记忆口耳相传下来、用汉初文字整理而成的“今文经”；当时盛行一时的“经学”，也被称为“今文经学”。

为了论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统治的合理性，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在利用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资料阐发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的同时，便已经有了“天人感应”、“符瑞灾异”等神学内容，而其末流更是完全离开儒家经典的“微言”，胡编滥造出种种古怪荒诞的“大义”，附会到天帝与孔子名下，因此在西汉中叶后，随着西汉社会统治危机的日益加深和统治阶级内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斗争的日趋激化，带有神学色彩的今文经学更进一步与秦、汉之际以来的鬼神符谶相结合而堕落成了谶纬神学。“谶”，本义是应验，实际上是一些宗教预言之书；

“纬”，是对“经”而言的，实际上是一些用神学迷信观点解释儒家之“经”的书。王莽建立新朝，刘秀光复汉室，皆曾得利于谶纬，因此，在王权的抬高下，谶纬神学在两汉之际甚嚣尘上。在汉儒制造出来的五花八门的纬书中，儒家经学中的孔圣人已变成了通天神人，儒家典籍已由“经”变成了神秘的“天书”，成了“天神”意志的体现。

除此之外，两汉之际，还有另一批人，他们面对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激烈斗争与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遂感到富贵荣华乃“浮云”，“保终性命”才是“真”，而且王莽之篡汉也粉碎了他们对儒家君臣礼仪的信仰，于是他们便纷纷遁入了道家“老学”、“隐匿山野”、“养志修道”去了。因此道家“老学”在两汉之际盛行了起来。在两汉之际的“老学思潮”中，出现了一批研究道家“老学”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老子指归》与《老子河上公章句》。《指归》与《章句》皆以探求避祸自保、“存神养和”、“保终性命”之道为己任，这既与先秦的《老子》有所不同，更与汉初“黄老之学”迥异，这实际上是两汉之际隐士们在乱世中求生存的心态的一种反映。

自从儒家在西汉中叶由子学上升为“经学”后，先是“今文经学”显赫一时，在西汉中后期又出现了谶纬神学与古文经学。王莽为了篡汉曾大力提倡谶纬，又曾利用古文经学为自己的复古改制提供理论依据，因此谶纬神学与古文经学在王莽时获得了很大发展。东汉初期，光武帝为了维持经学各派的平衡，对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神学采取了兼收并蓄、普遍扶植、分别利用的政策，使经学中的三个各自独立的派别在东汉前期皆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但是，到这时，经学本身所固有的致命性的弊端也已全部暴露了出来：一是经学各派各说各的，互相斗

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性的说法,无法履行统治思想的功能;二是“五经章句烦多”,圣人的“微言大义”已被淹没在烦琐支离的“碎语”之中,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缺乏力量。为了克服经学本身所具有的这些弊端,汉章帝于建初四年(公元79年)亲自主持召开了“讲议五经同异”的“白虎观会议”。在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直接干预下,经学各派互相协调,求同存异,终于在“三纲五常”的基础上,实现了经学与神学的结合,经学各派开始由纷争走向统一。“三纲五常”的道德教条也在神学的外衣下以法典的形式规定了下来。《白虎通义》便是这次经学会议的总结。它的出现,标志着汉代建立官方统治思想的终结。

当汉代学术界被今文经学、谶纬神学、世俗迷信搞得乌烟瘴气之时,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一批与儒家正统异趣的思想家,初有刘歆、扬雄与桓谭,而真正能够利用道家“天道自然”的学说与汉代自然科学的材料对神学经学与各种世俗迷信展开全面的批判与扫荡的则是东汉的王充。王充对汉代神学迷信的批判,给汉代学坛带来了几丝清新的理性之风,并对我国后来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思想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诚如侯外庐先生所说,西汉以来的儒学“正宗”地位,在遭受了王充的批判之后,虽然在形式上尚能维持其统治地位,而实质上已经起了根本的动摇。其表现之一是,许多儒者(包括一些名儒,如马融、蔡邕等),虽为了利禄而不得不研读儒典,但他们已经越来越背离了儒家的教义,而走上了儒道双修、融合儒道的道路。汉末的这种打破儒家经学的“家法”而兼融诸家的思想风气,预示着汉代经学已走到了穷途末路,并为后来魏晋时“援道入儒”、“以道代儒”的玄学思潮开启了先河。

## 二、“黄老之学”在西汉的盛衰

“黄老之学”是汉代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派别，它在西汉前期曾非常盛行，不仅是当时政治上的指导思想，而且还成了一种社会思潮。到西汉中期，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黄老之学”才开始走向衰落，但它的影响却远远没有消绝。

### （一）秦专任法家治国的失败与 “黄老之学”在汉初的盛行

秦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极为短命的封建王朝，它以法家而“倾邻国”、“雄诸侯”，并最后“兼吞战国”统一了天下，建立了一个幅员空前辽阔、国力空前强盛的秦帝国，但它也因法家的“专任刑罚”、残暴不仁以及无休止的横征暴敛、滥发徭役、穷奢极欲而骤亡。秦王朝在以法家作为封建国家统治政策的尝试中遭到了惨痛的失败。因此，探讨封建社会长治久安统治之术的任务便历史地落在了经历了秦末农民战争洗礼的汉初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的身上。他们从秦末农民起义的风暴中已经认识到单靠法家强权必然会重蹈亡秦的覆辙，而他们在自己建立汉家政

权的切身经历中也已认识到,以道德修养为已务的儒家和崇尚自然、消极无为的道家老学皆无力解决汉初民不聊生、经济凋敝、政权不稳等现实而又迫在眉睫的政治、经济问题,于是以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刑德并用为主要内容的道家“黄老之学”应时而成为汉初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并逐渐成了一种社会思潮。

除此之外,“黄老之学”在汉初的盛行,“也反映出当时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局势尚未巩固,功臣、外戚、郡国王还有着相当强大的势力,他们崇道黜儒,正是为了让皇帝垂拱无为,不去干预郡国事务”<sup>①</sup>,以使其既得的利益不受皇权的侵害。也正是因为这样,汉初竭力提倡道家“黄老”的人物是窦太后、曹参、淮南王等人。史称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sup>②</sup>;而汉初第一个明确地以“黄老之学”来指导政治实践的是齐相曹参,他“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拜盖公为师,“其治要用黄老术,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sup>③</sup>惠帝时,萧何卒,曹参代为汉相,遂将“黄老之学”由齐国带到了中央而推之全国。文、景二帝之时,继续以“黄老”治国。刘向说:“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静无为”<sup>④</sup>,《隋书·经籍志》也曾经指出:“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文帝的儿子汉景帝从小就在文帝和窦太后的教育下诵读《黄帝》、《老子》之书,所以景帝继承文帝的政策,举事无所变更,崇尚“黄老之学”。至于淮南王刘安,那更是郡国王中崇尚道家“黄老”的代表人物,他主持编写的《淮南鸿

①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史纲》(上),第139—14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史记·外戚世家》、《汉书·外戚传》。

③ 《汉书·曹参传》。

④ 《风俗通·正失》。

烈》实是一部西汉前期道家黄老思想的总集。<sup>①</sup>

在汉代大臣、外戚、郡国王的积极倡导下，道家“黄老之学”遂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上至皇帝（文、景二帝）、将相（曹参、陈平）<sup>②</sup>、名臣（汲黯、田叔、直不疑、郑当时、张释之）<sup>③</sup>，下至一般学者（如黄生）<sup>④</sup>、隐士（司马季主、盖公、王生）<sup>⑤</sup>，几乎无人不读“黄老”，无人不通“黄老之术”，“黄老之学”在汉初达到了极盛。

道家“黄老之学”在汉初的盛行，取得了非常明显的社会效果。到惠帝、吕后时期，已由“天下初定”时的“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凄凉凋敝的局面变为“天下晏然”、“衣食滋殖”的兴旺发展的景象。经过“文景之治”，经济繁荣已超过了战国，到汉武帝初年，七十年间国家无事，如果不是遇到旱涝灾害，“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廩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中的粮食更是“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原来的“天子不能具醇驷”的状况，到此时已经是“庶众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乘犢牝者摈而不得会聚”<sup>⑥</sup>。

总之，在总结秦王朝专任法家治国而骤亡教训的基础上，汉初的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终于找到了“黄老之学”这样一个能够解决汉初政治、经济实际问题的治国方略；秦王朝在探讨封建国家统治政策过程中尚未完成的任务，在汉初统治者这里临时有了“黄老之学”这个较为令人满意的答案。

① 后面有详细的论述。

② 陈平信奉“黄老”的记载见《史记·陈丞相世家》、《汉书·陈平传》。

③ 参见《史记》与《汉书》中的“本传”。

④ 黄生是司马谈的老师，是汉初著名“黄老”学者，参见《史记·儒林列传》与《史记·太史公自序》。

⑤ 参见《史记·日者列传》与《张释之传》。

⑥ 以上引文见《汉书·食货志》。

## (二) 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与“黄老”思想之谜的揭破

从古到今,人们历来都认为汉初以道家“黄老”治国,认为“黄老之学”在汉初曾风靡一时,并且认为“黄老之学”在汉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但是,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尤其是由于道家“黄老”之中的道家“黄学”一派的代表作——《黄帝四经》从汉代之后便失传了,这就造成了人们对“黄老之学”的种种误解,“黄老之学”也因此而成了千古难解之谜。

既然人们无从知道“黄老”之中“黄学”一派的真实思想内容,人们也就只好牵强附会地以“老”代“黄”了。明末清初伟大的思想家王船山在《读通鉴论》卷三评述西汉“黄老”政治家汲黯时就认为:“黯之学六,专于黄老。甘其食,美其衣,老氏之教也”,把“学黄老言,治官民,好清静,择丞史任之,责大指而已,不细苛”的“黄老”人物——汲黯当成了“甘其食、美其衣”的老学信徒。近人贺昌群先生也说:“汉初诸大臣如张良、肖何、曹参,皆以黄老术为政,并得保全其首领。文景之政,以慈俭为宗,此老子一书之应用于汉初政治者也”<sup>①</sup>。就连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和著名的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也认为汉初的“黄老之学”就是“老学”或“老庄之学”。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第八章中说:“汉兴,黄老之学盛行,主以清静无为为治,此‘老学’也”;侯外庐先生在其《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中也说:“汉代在初期与末期,都借重

① 《魏晋清谈初论》,商务印书馆出版。

老庄，初期试求复古于老庄以与儒学相抗，末期再试求复古于老庄以代替儒学，然都没有成为支配势力”。总之，汉初的“黄老之学”就是老子之学或老庄之学。

但实际上，当人们用老子之学或老庄之学来代替“黄老之学”时，有一个问题常常难以自圆其说，这就是：崇尚自然、消极无为、专注于心性修养而一味追求个人精神解脱的“老庄之学”又如何能使汉初凋敝不堪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走向繁荣，并使新生的汉家政权不断得到巩固呢？而且，汉初在“黄老之学”指导下所实行的各项政治、经济政策，汉初黄老人物的所作所为也与老庄思想相去甚远。例如，老、庄皆反对法治，认为“法令弥彰，盗贼多有”<sup>①</sup>，主张废除一切禁令和外在束缚而让人们任其自然、自由自在地生活；而汉初统治者却不是这样，从高祖刘邦的“约法三章”到肖何的“为法令约束”再到文帝的“好刑名之言”，不仅制订了一系列越来越繁苛的法律条文，而且还特别强调制订了法令之后必须秉公执法而不可随意枉法，强调以法律为准绳来处理一切事情。根据《史记·张释之传》的记载，张释之以“善为黄老言”的处士——王生为师，是著名的“黄老”信徒，他作为文帝时的廷尉，在处理所谓的“犯蹕案”与“盗高庙玉环案”时，并未因犯人惊的是文帝之马、盗的是“先帝庙器”便罪加一等，而是主张“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也”，认为只有法律才是判黑白、定是非的唯一标准。汉文帝对于张释之的做法虽然有点不太高兴，但因他也是“本修黄老之言”，深知秉公执法的重要性，因此他还是肯定了张释之对这两个案子的判决，并未因一时之怒而废法，也未因一己之利而乱法。汉文帝与张释之的这种秉公执法、不枉

<sup>①</sup> 《老子》第五十七章。

法、不废法的思想在老、庄那里是根本不可能找到的。又如，老、庄未尝有一言谈及生产，也无发展经济的明显要求，而汉初统治者却在“黄老之学”的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奖励垦荒、勿逆农时的让老百姓发家致富的政策，并使汉初经济由凋敝走向了繁荣。再如，老、庄皆竭力反对贵贱有别、尊卑有序的社会等级制，而汉景帝时的黄老学者——黄生在与儒经博士辕固生辩论汤武除桀纣是“受天命”还是“臣弑君”的问题时却说：“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也？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杀，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sup>①</sup>在此黄生所竭力维护的便是一种臣下绝对忠于君主的上下有别、尊卑有序、贵贱有恒位的思想。这种思想是道家老、庄所坚决反对的，而“黄老”学者——黄生却以此作为基本观点，如果说“黄老之学”就是“老庄之学”，那么这又如何解释呢？

直到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才为我们彻底搞清这些千百年来使人迷惑不解的问题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才使“黄老”思想之谜大白于天下变成了可能。因为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除发现了流行于汉初的两种《老子》版本（甲、乙本）外，还发现了和《老子》甲、乙本合抄在一起的另外四篇古佚书。这四篇古佚书有篇名而无书名。第一篇是《经法》，第二篇是《十六经》，第三篇是《称》，第四篇是《道原》。如果把汉初的政治、经济政策和汉初“黄老”人物的所作所为与汉初人手抄的这四篇古佚书相对照，那么，我们用“老子之学”或“老庄之学”所无法解释清楚的问题，在这四篇古佚书里全找到了答案：

<sup>①</sup> 见《史记·儒林列传》。

首先,关于法治的问题,老、庄虽坚决反对,但古佚书却认为“道生法”,认为“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sup>①</sup>。这些说法与“黄老”信徒张释之秉公执法的情况以及汉文帝不以一己之私而废天下之公法的做法是完全相符的;其次,关于发展经济的问题,老、庄皆不曾谈及,而古佚书却特别重视,认为“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时,时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节。知地宜,须时而树,节民力以使,则财生。赋敛有度则民富,民富则有耻”<sup>②</sup>。这些说法与汉初的与民休息、轻徭薄赋、让老百姓安心发家致富的经济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再次,关于社会等级有别的问题,老、庄皆坚决反对,而道家“黄老”学者——黄生却竭力维护,那么,黄生的思想源于何处呢?实际上,黄生的思想源于古佚书。因为古佚书曾明确说过:“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sup>③</sup>黄生的首足有别、上下有分的思想与古佚书的这种主主臣臣、上上下下、男男女女、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长长少少、贵贵贱贱的尊卑有别、上下有序的思想如出一辙。

由此可以看出,汉初流行的“黄老思想”与“老庄之学”的主旨多有不合之处,但与马王堆出土的《老子》乙卷本前四篇古佚书的内容却完全一致。那么,这四篇古佚书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书呢?

首先,我们认为,这四篇古佚书属于“黄帝书”。《淮南子·修务训》有言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

① 引文出自古佚书的第一篇《经法》中的第一节《道法》。

② 见古佚书《经法·君正》。

③ 见古佚书的第三篇《称》。

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淮南子》的这段话，道出了一个真情，这就是在战国、秦汉之际，诸子各家为了抬高自己学说的地位并取得时君世主的信仰，多依托远古之人来著书立说以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最明显的如儒、墨两家皆祖述尧舜，农家许行则言必称神农，道家则依托西出函谷关的隐士老子。而实际上，随着战国以来大国争霸局面的形成与统一形势的出现，黄帝的形象已经变得越来越高大，在政治军事上，黄帝成了战胜一切邪恶、统一四方的英雄；在思想文化上，黄帝成了人类文明的缔造者，成了思想理论上的权威代表。因此，从战国中期以来，出现了一个依托黄帝而著书立说的时代，一大批依托黄帝而写成的书涌现了出来。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这些“黄帝书”共有十二类二十六种，其中道家类五种，阴阳家类一种，小说家类一种，兵阴阳家类五种，天文类二种，历谱类一种，五行类二种，杂占类一种，医经类一种，经方类二种，房中类一种，神仙类四种。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这四篇古佚书因其通篇都是假借黄帝、黄帝与其大臣的对话来阐述其政治、经济、伦理学说的，因此这四篇古佚书是当时流行的“黄帝书”中的一种当是无可怀疑的。

其次，我们认为这四篇古佚书属于道家类的“黄帝书”。在《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十二类二十六种“黄帝书”中，道家类的“黄帝书”共有五种，占了较大的比重，而马王堆出土的这四篇古佚书当是其中的一种。因为这四篇古佚书虽然在政治、经济思想方面与《老子》的思想有较大差异<sup>①</sup>，是对《老子》思想的改造

<sup>①</sup> 如，前面提到的，《老子》反对“法治”，也不谈生产，而古佚书却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

与发展<sup>①</sup>。但在自然哲学与人生哲学方面,却与《老子》的思想完全一致。与《老子》一样,古佚书通篇都是以“道”为宗,认为“道”是宇宙万事万物的最高主宰,并专辟一篇《道原》来探讨“道”的特性与作用,其对“道”的看法与《老子》的看法毫无二致;不仅如此,道家《老子》的“无为”、“不争”、“贵柔”、“守雌”等人生主张也是古佚书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又加上这四篇古佚书是和道家《老子》合抄在一起的。因此,这四篇古佚书只能是道家类的“黄帝书”,而不可能是其他类的“黄帝书”。对此,学术界已有公论。

再次,我们认为这四篇古佚书便是《黄帝四经》。在《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道家类“黄帝书”中,除了首列的《黄帝四经》四篇外,还有《黄帝铭》六篇、《黄帝君臣》十篇、《杂黄帝》五十八篇、《力牧》二十二篇。那么,马王堆出土的这四篇古佚书到底是道家类的哪一种“黄帝书”呢?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黄帝铭》?《黄帝铭》在《汉书·艺文志》上所载是六篇,显然与古佚书四篇的篇数不符。而且顾实《汉志讲疏》说:“黄帝《金人铭》,见于《荀子》、《太公金匱》、刘向《说苑》;黄帝《巾几铭》,见于《路史》。是六铭尚存其二也。”今取其佚文与古佚书相对照,从文体到内容均不相同,可见古佚书不是《黄帝铭》;那么,是不是《黄帝君臣》十篇呢?也不太象。一是篇数不符,二是古佚书讲黄帝君臣的只有《十六经》一篇,而且在《十六经》的十五小节中,真正涉及到黄帝君臣的也只有八个小节,更何况古佚书在讲到黄帝与其大臣时还带有强烈的神话传说的色彩。可见,这四篇古佚书也不是《黄帝君臣》十篇;另外,这四篇古佚书也不是《杂黄帝》五十八篇与《力牧》二十二篇。--是因为这两部书与古佚书的篇数相差太远,

<sup>①</sup> 例如,古佚书的“无为而治”便是在改造《老子》“无为”思想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政治学说。后有详述。